

## 第四章

### 批判理論

#### 法蘭克福學派與哈柏瑪斯

馬克思主義學家長久以來的期盼，就是能產生無產階級意識，進而推翻壓迫的資本社會。1920 年代，一群西方學者開始對這樣可能開始感到絕望；事實上，1917 年在準俄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對最初馬克思主義者所分析的資本主義感到懷疑，許多社會學者認為回歸到計畫階段，是爲了去發掘爲何即使不公平與疏離持續，革命仍會延遲的原因，以及需要作什麼才能改變情勢，以求迎接改變成新社會主義政體。這是此篇文章所探討的核心重點。

即使前社會主義政體在二十世紀有不太渴求的真相或公平狀況，部分社會主義學者仍對社會主義終將轉化保持樂觀，但是在二十一世紀初許多西方社會學者則認爲，資本主義似乎是贏了，而且也不認爲有必要去追尋舊的、對於平等與計畫已是名聲敗壞的十九世紀夢想；然而在非洲、中亞或是俄國本身，以及被資本主義政體所拋棄的許多人，他們對資本主義的勝利並非興高采烈。有鑑於此，有必要以批派理論解釋，爲何二十世紀無產階級勞工轉化至世界會失敗，同時反映在二十一世紀仍能辨識革命階級的可能性。

#### 社會研究學會

法蘭克福大學的社會研究學會成立於 1921 年，那時在歐洲與德國是個混亂與動盪的時期，即使如此，革命並未如許多馬克思學者所預期般地發生，真正發生的是保守主義升高，在德國達到最高點形成國家社會主義政體。

學會之所以能夠成立是來自一位移居阿根廷的富有德國人 Hermann Weil 的捐贈，Weil 將他所賺得的財富送回歐洲，他的兒子 Felix Weil 就讀於法蘭克福大學並取得政治學博士。Felix Weil 在法蘭克福逐漸和好幾個激進團體有關，並產生爲馬克思主義研究與反猶主義而成立獨立研究機構的想法。Felix 說服父親捐贈學會，而他自己也投身於此，一直直到二次大戰開始他回到阿根廷照料家族事業爲止。

1930 年代反猶主義在德國因國家社會主義法西斯份子的推波助瀾下更加明顯。學會主要的研究要務爲分析反猶主義，以及探討達到解放、公平社會的社會文化條件。學會很幸運地享有財務獨立，當時在三 0 年代，學會的猶太成員被強迫放逐。1934 年這個學會與由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主導的哥倫比亞大學有關，因此這個革命與馬克思主義研究學會安頓在資本主義的中心——紐約。

很多學者與學會有關，除了霍克海默，還有亞當諾（Theodor Adorno）、盧卡契

(Herbert Marcus)、路文陶 (Leo Lowenthal)、波洛克 (Friedrich Pollock)、Karl Wittfogel、本雅明 (Walter Benjamin) 與佛洛姆 (Erick Fromm)。這些學者產出大量的著作，而且包含相當多有洞見的，例如路文陶對文學有興趣，亞當諾則是傾心音樂，波洛克研究資本主義與國家間的交口，佛洛姆綜合馬克思主義與心理分析主義。即使每位學者都和學會批判馬克思主義觀點有關，但是他們並沒有持有單一理論立場，或是必須贊同革命實踐的共通看法，由此可知，把這些批判理論學者視為法蘭克福學派在某種程度上是會誤導，因為並不屬於單一重點團體。

霍克海默在 1930 年成為學會主任，在他任內，他強調學會要成為哲學家、社會主義學者、經濟學家、歷史學家和心理學家都必須持續地成為工作夥伴關係，以最精緻的方法去追尋偉大的哲學問題。學會的主要研究集中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異化與宰制，學會研究是超越學科而不是在各學科間的，也就是說，研究與理論態度是優於個別學科的位置，以建立一個超越學科的社會理論。

之所以能說服、建構為超越學科的研究本質，是因馬克思主義是開放、歷史、辨證的理論，它需要精確的發展、修正與調整，因為它是當代社會歷史現實，不斷發展與改變。學會研究者看到他們任務的急迫性，因為即使一再發生資本主義危機，但是受困於法西斯主義湧現與缺乏勞動階級革命的熱情。

馬克思主義理論與實踐的重新考量，特別集中在勞動階級的革命意識問題。霍克海默、亞當諾與馬庫色在 30 年代推論，應再表述傳統馬克思主義者在革命勞動階級的焦點，因為虛假意識箝制階級，穿透最深層的人類性格，在這樣的政治與社會背景下不可能立即產生階級或個人的解放行爲。這樣對於勞動階級革命的悲觀可能一直持續，尤其在二次大戰開戰後。

1933 年當納粹得權後，霍克海默和其他猶太成員自法蘭克福大學驅逐，學會所集合的優秀智力因而分散。大部分學會的學者具有猶太背景，因而被視為是相似的。不論他們的信仰有多相似，他們都突然領悟到國家社會主義崛起的意圖，而且大部分學會成員都聰明的選擇流亡，他們前往瑞士、法國、英國與美國。

霍克海默去紐約加入波洛克和亞當諾。很幸運地，在流亡年間以及學會在紐約最初成立時，Weil 家族的私人捐贈仍維持學會處於相當的財務無慮。基本上，霍克海默、波洛克和亞當諾在流放期間代表學會，在 1940 年代三位在洛杉磯直至 1950 年返回法蘭克福。其他學會流亡者則另謀多種職位，例如馬庫色服務於策略服務辦公室 (the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與國務院，之後在 1954 年前往布蘭戴斯 (Brandeis)，1965 年前往位於聖地牙哥的加州大學。

在這個章節中，我們專注於霍克海默、亞當諾、馬庫色與佛洛姆的著作，他們主

張的大綱為當代批派理論者哈貝馬斯(Jurgen Habermas)的驗證基礎，其將出現在後面的文章。

### 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學者

我們把自己界定在尋找人類的為什麼，不去進入真實的人類狀態，反而是去插入新類型的野蠻。

**霍克海默（1895-1973）** 霍克海默的父親在斯圖加特（Stuttgart）是個製造業者，霍克海默在服兵役前曾接受商業訓練，有一部分訓練是與他的朋友波洛克在 1913 年—1914 年前往倫敦和布魯塞爾學習法文和英文。1918 年之後他就讀慕尼黑、弗萊堡（Freiburg）與法蘭克福的大學，後來於 1922 年在法蘭克福取得博士學位，論文有關康德。他在 1925 年成為社會研究學會的講師，1929 年被指派為學會社會哲學的新任主席，1930 年成為學會主任。

**亞當諾（1903-1969）** 亞當諾出生於法蘭克福，他的父親是個成功的猶太商人，而母親在婚前曾擁有出色的歌唱事業，亞當諾是她娘家的名字。她是德國歌手與法國軍官的女兒，她的父親擁有科西嘉與熱亞那的背景。很顯然地，回應波洛克的憂慮，學會名單中有太多猶太音名字，亞當諾在美國時拿掉名字中的 Wiesengrund。

由於跟他們家同住的阿姨是曾開過音樂會的鋼琴家，早期亞當諾的家人鼓勵他學習鋼琴和作曲，這樣對音樂的喜好在他從事文化產業本質在資本主義社會研究時仍一直持續。亞當諾進入法蘭克福大學，以胡賽爾（Husserl）的現象學論文於 1924 年取得博士學位，1925 年他前往維也納向貝爾格（Alban Berg）學習作曲，也是在那個時候開始欣賞荀伯克（Schonberg）的無音調實驗。1928 年返回法蘭克福，1931 年開始與學會有關係，1938 年成為全職成員。

**馬庫色（1898-1979）** 馬庫色出生於柏林，來自富足、被同化的猶太家庭。1918 年在他服完兵役後開始與柏林的社會民主黨與革命軍議會往來，1919 年以離開社會民主黨作為看到黨背叛無產階級的抗議。

馬庫色在柏林與弗萊堡的大學攻讀哲學，1923 年獲得文學博士，之後六年在柏林是個書商、從事出版業，1929 年回到弗萊堡跟胡賽爾與海德格（Heidegger）研習哲學，1932 年離開弗萊堡，絕大部分的因素是與海德格的政治歧見，海德格的右翼觀點與馬庫色的馬克思主義衝突，不過在胡塞爾的推薦下，馬庫色於 1933 年成為學會的一員。

**佛洛姆（1900-1980）** 佛洛姆生於法蘭克福，成長於宗教氣氛濃厚的環境，他的

猶太雙親都是出自猶太司長（rabbi）家庭。在他二十歲出頭時與後來也是學會一員的路文陶，活躍於由猶太司長組成屬於法蘭克福最大猶太教會中的宗教團體。佛洛姆在 1926 年於慕尼黑研究後減少東正教比重，但他從未棄絕他的宗教。

師承韋伯（Alfred Weber），佛洛姆在海德堡以猶太法律：海外猶太人社會學的貢獻獲取博士學位；佛洛姆在海德堡也認識了 Freida Reichmann 猶太心理分析學者，後來成為他的夫人。他繼續在柏林精神分析學會受訓，之後於 1927 年自行開業。1929 年法蘭克福精神分析學會成立，佛洛姆與其夫人都成為新學會的講師，1930 年他成為社會研究學會中社會心理學部門的主任，他對結合馬克思與心理分析的興趣引起霍克海默的注意，不過佛洛姆與學會的關係在 1940 年以前就結束了，主要原因是霍克海默不同意佛洛姆對佛洛伊德的批評。

### 法蘭克福學派的心理理論與方法

多位學會成員的理論背景大不相同，但大部分研究中最重要的是海格爾（經盧卡契 Georg Lukacs 過濾）、馬克思、韋伯與尼采。批判立論涉及描述與分析現代社會和與過去相關的理論發展，為此使他們很沉重的了解到造成壓迫的力量；此外，分析也顯示壓迫如何被新的、解放的概念化與實踐所推翻。

批判理論學者關心在現代社會啓蒙合理性的承諾如何被推翻。根據霍克海默，現代社會的主要問題是作為倫理、道德、宗教代理人的理由清償。如韋伯指出，理由已經合理化，走向官僚、控制的情勢，而不是自由平等的社會。

**理由與客觀** 霍克海默區別主客觀理由。**客觀理由**是指為決定社會目標的手段，客觀理由是一個力量，不只存在個人心理也在客觀世界，是人類、社會階級、社會組織、大自然間的關係，並得以顯現。

**主觀理由** 只是單純地關乎於手段和目標，為目的偕以適當程序，多少視為理所當然，並大概地自我解釋。主觀理由是手段的理由，它對是否目的是有理由的加附一點重要性，或者只是公平的。當主觀理由在作道德選擇時建立在「正當」的基準時，顯然典範的接受性、我們行為與信念的標準、道德與政治的領導原則，所有我們最終決定都是取決於事實而非理由。

把焦點放在主觀的或手段的理由是作為實證哲學的證據，表示理由可以很容易的被納粹驗證利用，組織憂慮用於消弭貧窮與苦難。主觀與手段性理由涉及到把科學的事實分類與可能性估算升級，是唯一「權威」。在主觀理由方面，正義與自由優於不公平及壓迫這樣的論述是在科學尚未能證實的，而且也沒有價值的，這就好比是「紅色比藍色漂亮」的陳述一樣。

批判理論學者主張，不可能不去關心客觀研究，因為事實與價值密不可分，而且研究者總是屬於該受調查的社會情境中的一部分。更精確的說，正面方法基本上被拒，在實證理論的數學獨有信條，是心理分析的技術官僚。霍克海默與亞當諾堅稱實證理論所看到的世界只是「事實與事情」，未能將事實與社群與個人的需求與渴望加以連結。

另一方面，批判理論也不是只理解歷史發展的多重事實，但也從歷史與相關現象看到了事實本身的意圖。依量化方法所確認過所謂的事實，也被實證主義者傾向視為是唯一的科學，通常只是表面現象，其昏暗不清，並沒有揭示根本現實。批判理論者的要務就是去揭露真實情況本質的「事實」，為此，為非傳統與解放的現實提供藍圖。

對批判理論學者而言，社會狀況的分析是一項道德事業。霍克海默認為康德道德一般概念的義務與責任是抽象概念，沒有滿足處於改變社會中人類的需要。人類的本質是會不斷地被各種事情影響與改變，而且沒有一個慣例是永遠可以對個人、社會與自然間的關係加以界定。應該只有一個道德典範—幸福，因為人類無法從追求幸福與懼怕死亡中脫逃。

霍克海默相信要從有可能的啓蒙客觀理由轉化到現代的主觀，手段性理由不會是意外，也不能再任意實踐、肆意地保留。海格爾指出理由根據歷史而改變，但並不保證先進辯證是通往自由；如同馬庫色指出，反駁是辯證法的中心範疇。反駁可以表示從不合理變成合理，例如決定事實，在此不自由是自由的條件，而戰爭是和平的保證。

在現實社會，理由是忍受不公平、勞苦與苦難的手段；同時運用理由就是未來的最佳希望。例如馬克思主義以理由之名，型塑成如黑格爾哲學的評論，在現代社會理由只能透過不斷的批評，然後個人才能了解社群生活的矛盾，並尋求方法以超越它。

**解放理論** 如同馬克思，批判理論學者強調理論性的批評不只是一要「事實」的合理方法，同時也幫助個人了解這「是」什麼，為此去看這「可能」是什麼。在方法論上，批判理論克服在理論與實踐間、理想與現實間的斷裂，藉此可以真正繼承馬克思主義。

馬克思指出資本主義是反駁聯盟，要從剝削中獲取自由，從貧乏獲取財富，從限制消費提升生產；所以說資本主義的非常辯證架構是：經濟過程的每種型式與組織引發反駁，而危機就是以反駁所表現的極端形式。如果啓蒙與進步代表，從邪惡力量的迷信思想、妖魔鬼怪、盲目害怕中解放人類，簡而言之就是從恐懼中解

放，然後譴責目前所謂的理由是所能給予最大服務的理由。負面批評從不實極點的殘骸拯救有關的真相，然後引導到對反駁的理解，因為藉由陳述其相關性拒絕主流意識形態的絕對主張，以及現實的倉卒主張。

理論性批判對革命性的改變看來好似需要，其實是並不充分的條件。就如同馬庫色說明，即使理論仍是最主要的，但是實踐跟隨事實，而非反其道而行，改變需要催化動力。不過對學會學者而言，在資本主義壟斷的情況下尋找催化動力是個問題。馬克思所想像以資本主義去滿足大量需求的無產階級異化似乎被推翻了，結果增加勞動階級與以批判之名行事個人間的意識差距。革命勞動階級意識的缺乏、獨霸資本主義以及獨裁政體的鞏固，都在不遠未來產生對於解放轉化可能的悲觀看法。

不過批判理論學者指出，即使資本主義可能滿足許多無產階級的需要，但是增加消費並不必然轉化成人類滿足，而且絕對無法抵銷無產階級的勞動異化。資本主義，特別是獨佔資本主義是根據營利而非人類需要來調整消費，它愚弄消費者去相信他們的選擇是能滿足所需。

不論消費者偏好哪一個品牌，即使得到他所選擇的，並不代表他所付出錢就值得，兩個等價熱門商品的品質區別就好比是兩個品牌香菸的尼古丁含量的差異，實在非常有限。

即使消費者對選擇產生懷疑也不過是個假象，因為具體化的普遍性，所以並無法保證革命意識的產生。**具體化（Reification）**意指宰制（domination）的過程，其藉勞力呈現在外部事情的表象而且可由人來控制。舉例來說，經濟波動常被歸罪於「市場」運作，但是市場並非抽象、不可抗拒的力量，而是由人對金錢、商品與貿易所作出的決定。

韋伯（Max Weber）的好友盧卡契稍早前曾開發、闡述具體化理論。他在《歷史與階級意識》（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1923）建議，無產階級受困於資本家的想法，這樣的想法去相信資本主義和異化的勞力是「自然的」，也就是抽象市場動力是無法避免，個人也不能控制。因此盧卡契認為，戰勝具體化是先鋒知識份子的要務，藉由教育無產階級，助其了解在生產關係的「真正」定位，並表明無產階級是可以掌控自己的命運。

對批判理論學者而言，具體化是客觀過程也是資本主義交換關係的一部分，而主觀是內含在信念和了解中。具體化是不真實的意識，是自我打擊的異化，異化是個人和社會階級自受的。因此批判理論的義務是要在無產階級中，協助產生革命的意識與實踐。

**佛洛姆與佛洛伊德** 簡單的經濟決定論不是革命轉化的動力，深藏在意識中的文化或意識形態同時也在產生扭曲性格，扮演重要角色，這樣的個性產生優勢狀態。這個層面的理解對佛洛伊德的研究批判理論很有幫助，因為它為不實意識提供解釋，同時也解釋現代社會的權威個性類型。佛洛伊德的性慾理論也堅持，完全宰制會被推翻，基本上人類對自由的渴望。

佛洛姆把佛洛伊德的研究納入其批判理論的中心，主張心理分析理論和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論並立，因為它揭露受行為控制的無意識性動力，非理性行為在社群生活—宗教、風俗、政治與教育都有其緣由。

馬克思主義者通常認為隱藏在人背後、使其行動與指引的是經濟動力和政治扮演；心理分析研究指出如此過於狹隘。社會是由人所組成，而人擁有狂熱爭取的潛能，這種人類潛能是被每個社會的經濟總體與社會力特色所型塑而成。這些動力產生了特定的社會無意識，並在壓抑因素與所給予的人類需求間造成衝突，而兩者都是人類功能的關鍵（例如特定程度的自由、鼓舞，生活樂趣、幸福等），發生革命並非只是新產生的動力，也是人類本質的部分壓抑，只有在兩者結合才會成功。

心理分析的焦點在於家庭，其對批判理論相當重要，因為透過家庭，社會壓制個人個性，特別是透過家庭，社會重建階級架構；此外，家庭也會產生支持反猶主義的獨裁性格，。

為研究何種經濟與政治結構影響個人的精神生活，因此促成**權威與家庭研究**的學會計畫，1930年代由德國主持，1940年代由美國主導。由亞當諾與霍克海默合著的《啓蒙的辯證（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1944）》為獨裁性格的發展與法西斯主義社會的源頭探索社會與歷史基礎。

### **社會本質、人類和改變**

**現代資本主義社會** 批派理論學者主要把焦點放在現代西方社會的本質以及資本主義的歷史發展。主要轉化是個人競爭資本主義的替代，與獨斷及國家資本主義（請見第五章）。國家資本主義在二次大戰後取代自由資本主義，社會評論就不再只是單純的政治經濟批評。

這不再是屬於自由市場、自由政體的資本階級公共範疇，其迎合批評者去實行法治。解放的規範在公共與組織化的架構也不再迫切；相反地，必須從文化、藝術與哲學的未達理想而去追尋，或是在人類主觀的深層架構下推翻壓制。

大眾文化與社會支配的延伸將資本主義體制轉化為心理分析，以及人類的經濟經驗，這代表韋伯所討論手段合理的勝利。**手段合理**（Instrumental rationality）是在現代社會的壓制機制，使人性喪失作為與合理性或理由緊密結合，關切人類價值與正義。霍克海默甚至在戰勝法西斯主義後談到：

希望人類可以更為滿足，過去是群體時代而今天首度由人道主義者界定。技術性知識平行拓展到人類的想法與活動，他有個體的自主權，他有能力抵抗大眾操控的成長組織，他的想像力與獨立判斷似乎減少。為達到啓蒙而產生的先進技術工具同時也伴隨去除人性化過程。

韋伯對於官僚化、沒有人情味的「冰冷黑暗」世界的恐懼，對批判理論學者而言似乎是可以理解，這將使要以何種方式去解放改變都變得困難。

諷刺的是，馬克思與韋伯都了解，當科技與科學逐漸成為人類所需的單一決定要素，促使人類控制自然世界的技術性「進步」會變成「進步的奴役」。

現代人類的消退本質不能自社會進展中分開。一方面，經濟生產力的成長供養世界獲得更好的正義；另一方面，它也容許操作比例不均的技術組織與社會團體優於其他人。即使如此，個人會在組織提供其所應得之前消失，組織供給他過去所沒有的。

批派理論者早期同意馬克思的想法，科技對人類需求的滿足是可控制，是樂觀而非悲觀的方法，但是後來因大屠殺而放棄這樣的樂觀。

我們這個時代的人是烈士，經過烈獄般的苦難，在墮落中反抗征服和壓迫，沒有流行文化的誇張個性與傳統式的顯要。集中營的無名烈士是為爭取人道而生存的表徵，哲學要務是將他們的所作所為翻譯成語言好能被聽見，即使微弱的聲音被暴政消音也必須為之。

純粹技術專業與「現代」人類所產生整個人道部分的拔除有關。似乎在現代社會，意識與個人責任「客觀地」降低絕對官僚化的情況…，在此組織功能決定且優於個人的自主權。現代人類所消退的本質不能自社會進步分離，而且即使個人會在組織提供其所應得之前消失，組織供給他過去所沒有的。在不義的生活狀態，大眾的無能與順從增加，並也允許他們增加商品量。

霍克海默指出，「個人」的現代慶祝是很諷刺的。啓蒙在機器為人類工作的夢想已經實現，但同時人們的行為也越來越像機器。社會文化和商品激增滿足虛假的

需要，也延伸了資本主義的宰制。舉例來說，「真正的你」是由你所穿的衣服、所開的車子，甚至用的牙膏所界定。佛洛姆指出，我們喝的是商標。拿著可口可樂的瓶子，我們喝的是廣告上帥哥美女的照片，我們喝的是廣告標語（the pause that refreshes）...至少我們有用味覺飲用。個人在奴役消費者與大眾文化觀眾的「單一尺寸社會」會被科技推翻。佛洛伊德認為主觀對批判理論很重要，因為個人的自主權在消退，以社會上的批判反應可能也能引導到解放的實踐。

**人類本質** 人不能自社會分離，因為個人只是所屬全部的一部分。他的關鍵決定、特色與傾向、興趣與對世界的看法都源自最初的社會以及所處的社會命運。孤立的個人只是假象：最受人尊敬的個人特質，例如獨立、爭自由、同情心與正義感，都是社會及個人的美德。因此，個人的解放並不只是從社會解放出來，還有社會自霧化走出...如此可能達到文明時期與大眾文化的巔峰。當社會改變，人的個性也會跟著變，今天年輕男女的理解，基本上就與本世紀初的有很大的差異，這表示必須揚棄人的本質是無法改變的想法。人類的需要，「包括在性方面」擁有「歷史性的性格」。

亞當諾與霍克海默用荷馬史詩中奧德休斯（Odysseus）從特洛伊（Troy）到伊薩基（Ithaca）的旅程，說明人類對大自然的控制，以追查現代精神壓迫。兩位指出對大自然的控制對人之所以能成爲人是必要的，同時也標示了人類自我壓迫的開始。在奧德休斯旅程的重要事件是他從賽倫（Siren）逃出。當他聽到賽倫的歌聲時，他必須從斯庫拉（Scylla）和卡律布狄斯（Charybdis）間通過。不管來自哪裡，斯庫拉和卡律布狄斯有權抓補。因爲沒有人能抗拒賽倫歌聲，抓捕賞報可說是勢在必得。賽倫代表感官、自然世界，也是佛洛伊德的世界。奧德休斯很巧妙地找到抗拒賽倫誘惑的方法，他把蠟放到船夫耳裡，所以他們不會聽到歌聲，而他自己則是綁在桅杆上，所以即使他自己可以聽到歌聲但不會屈服、受到誘惑。奧德休斯相反地找到脫逃的條款，得以巧妙脫逃的加以完成，所以他對賽倫有主觀需要但並不去服從他。

奧德休斯能夠戰勝自然，但是付出的代價是壓迫自身本能內在的天性，因此，他成爲資本家的模範，資本家愉快的決定對理性資本主義的成功是關鍵。奧德休斯的策略也爲強化相較於其他人的優勢，其他人聽不到歌聲而只能依賴奧德休斯的判斷。船夫結合在同一個節奏下，就好像在工廠的現代勞工一樣；而且他們的無能也像現代勞工，不只是單純作爲執政者的策略，而是終於改變個人社會邏輯推論。就長遠來看，自然的馴化導致「資產階級的商品經濟」，且爲「新野蠻」建立條件。

本能天性的壓迫很必然地爲個人和社會進步產生變革，這就是佛洛伊德所稱的**唯樂原則（pleasure principle）**到**現實原則（reality principle）**。

唯樂原則	現實原則
即刻滿足	延緩滿足
快樂	限制快樂
喜悅（玩樂）	勞苦（工作）
接受力	多產
沒有壓制	安全

轉變的結果是從不可抵擋進步的詛咒變成不可抵擋的退化。

亞當諾與霍克海默在 1940 年代後對任何集體解放計畫更加悲觀；不過，盧卡契建議本能壓抑與優異充分的技術理性結合可以是解放運動的來源，也就是說，太多的壓抑一定有最終的反抗，對抗那些壓制的力量。

**社會改變** 盧卡契建議佛洛伊德的性壓抑並不是單一、靜止的現象，它是多元，有關社會改變。在現代社會，壓抑是意味深長的。產生**過度壓抑**（Surplus repression）肇因資本主義所產生的富足能讓人從社會中解放，越接近自經由不足與未成熟合理化所約束中解放個人的真實可能，對維持與合理化約束以免於優勢瓦解的需求就越強烈。過度壓抑對優勢控制的興趣更勝過對人類文明發展的關心。

可以透過關於勞力時間與經歷大量生產導致人類存在的品質改變，以及擴大自由範圍成為真實活動的事實，以破壞過度壓抑。時間在理性與非理性權威間、以及介乎壓抑與過度壓抑的區別是能由個人來界定與證實。假使人們無法現在加以區分兩者，並不表示給他們機會但仍無法學會。

透過**大拒絕**（great refusal）可以完成自「鐵籠」中脫逃，這裡的拒絕是指「接受」消費社會。馬庫色相信這樣的拒絕不是出自勞工階級治，因為他們被先進的資本主義所吸收，去滿足消費需求並產生酷似「美好生活」。大拒絕出自下層被逐者與外部人、被其他種族所剝削殘害者、失業與無法工作者，他們存於民主社會之外，而他們的態度是革命的，即使本身並無意識。當這些人開始「拒絕玩這場遊戲」，「終結的開始」就能看見了。

馬庫色希望 1960 年代多種跨文化活動表示大拒絕的開始。對他而言，愛與性的自由是通往社會轉變的道路。當個人開始認知到社會過於合理化，孩童多型態性慾產生逆轉，那是現代、後戀母情結（post-Oedipal）生殖性慾的壓抑。身體將只是「快樂的工具」，如此加速單性與家長制家庭的瓦解。作為社會轉變的動力，馬庫色對性革命樂觀的預測早在包括愛滋等性傳染病嚴重問題發生前，就已認知

到了。

亞當諾、霍克海默甚至馬庫色都了解，轉化是客觀必要，但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中，這個需要在界定轉化動力的社會階層間並不明確地呈現。但是，不論是以大拒絕或其他型式，反抗仍是極為重要，因為新舊法西斯主義非常不同。新法西斯主義以壓制立法及大眾的支持破壞民主，如此使既有文明與政治民主後退。今天部分學者主張這些確實發生在二十世紀末的西方社會，而且非常重要的社會學問題仍然存在，誰又能抵抗之？如果不是勞工階級，也許反抗會來自兩性平權主義者或少數民族。

### 階級、性別與種族

**階級** 批判理論者體認到現在社會的階級區分，但是並沒有提供階級的系統分析，他們更關心心理與經濟壓迫會以何種方式推翻馬克思主義政治。家庭是心理壓迫的主要制度。佛洛姆指出家庭是通往社會或社會階級的媒介，它對孩童甚至成人訂出明確架構。家庭是社會的心理仲介代理。

學會於 1930 年代進行*權威與家庭研究*，探討家庭本質在工業資本主義下所產生的精神壓制。批判理論者指出，家庭並不是自然、不會變化的型態，而會因應外在社會與歷史條件改變。家長制、中產階級家庭是特別為個人資本主義的需要所發展而成，它是理想的家庭型態，傾於普遍並確立主觀的優勢。

*權威與家庭研究*以德國勞工態度與信念的經驗主義為基礎。發給勞工三千份問卷，詢問他們對孩童教育、工業合理化、避免新戰爭，以及政體真正權力的看法。

在這個研究中採用了一項重要的創新方法，答案是逐字紀錄，然後分析心理分析學者所聽到病人的關係，關鍵字是指稱那些答案內容的潛在精神分析現實。這項研究揭露信念與性格間的不一致，研究發現大約有 10% 的答覆者出現獨裁主義者性格，大約 15% 有獨裁主義的觀點，大多都是有矛盾情緒。

霍克海默與亞當諾在資本主義政體下，家族制與中產階級家庭是獨裁主義性格的基礎。戀母情結衝突涉及到母親的拒絕並支持父親權威，這對兒童的意義是去接受社會權威。孩童將對父親權威的「理性」適應內在化，以產生強烈的自我意識與超我，或者是善惡觀念，去調適資本主義社會的需要。

個人的自我控制、對工作與紀律的處理，以及建立家庭、特定理念、實際生活的協調性、理由選擇、在建設性活動中產生堅持與快樂，這些都是可以去發展的能力，在這個情況下，只有在受過自我教育的父親指導下，能在學校生活中勝出。

很明顯地，這裡的孩童指的是個男孩。在早期資本家、中產階級社會，父親權威提供兒子目標去加以反抗，這樣的反抗產生個人自主權以及拒絕宰制的能力。然而隨著自由主義轉化，從企業家資本主義到國家資本主義，父親的經濟權力與家庭權威式微。孩童仍有戀母情結的複雜，但了解到父親並沒有賦予完全權力與權威，然後去尋求父親的替代以建立更強的自主。不過，單就父親替代是工具性理由的抽象權威，隨著結果，孩童變成大眾個體、受外界宰制的社群原子，他們是自戀、唯物主義、殘酷成性，而且無法抵抗宰制。孩童了解不是父親，而是玩伴、鄰居，合夥同伴，運動、銀幕上的領袖，是適當心理與生理行為的權威。我是張吉米 <jimmy168@ms13.hinet.net>

獨裁者、法西斯主義領導者的協定基礎，是建立在轉化家庭關係的精神附帶條件。從他們研究德國工人的家庭生活，批判理論學者推論，德國勞工階級對右翼政權的反抗，遠不及激進意識形態所建議的，而國家社會主義的一般熱情也支持這樣的結論。

**性別** 霍克海默與亞當諾把焦點放在處於國家資本主義家庭的男孩問題。母親，也是自然的代表，在早期中產階級資本主義階段，其對男孩是安全與舒服的來源。女人一般而言是不可抗拒且無權力的難以理解形象。母親提供躲避父親權威的慰藉，而她無條件的愛也是情感支撐的來源，以另一種眼光、幻想的現實提供給孩子，這是本能愛神的眼光。相反的，對於理性權威，快樂信條與現實信條相反。

根據批判理論學者，當女人進入生產範疇，以及她們許多的社會化要務都被組織接管，此時田園式的情境就會改變。母親停止提供躲避父親權威的慰藉，因為她變得越來越像男人。對於亞當諾、霍克海默與馬庫色，這是負面的一步。舉例來說，馬庫色認為對女性很自然，且建立在承諾喜樂、和平、終結暴力的女性信條，同要是男人與女人的解放基礎。

頌揚女性信條在批判理論學者的研究中是個盲點。這個信條僅重伸性別二分法支持資本主義父權制，母親可能代表對兒子的解放承諾，但此承諾並沒有擴及到女兒身上。佛洛伊德說明，女兒必須拒絕母親優於父親以建立成熟的女子氣質；同時，如同她們的母親，必須向男人體現相同解放的承諾。

這裡有一些批判理論者對十九世紀中產階級家庭的懷舊之情。他們看到家庭型態的毀壞，愛的範疇遭破壞以及對大眾社會的手段反抗可能。但是男性所提供的感情支援混淆對家庭型態、母親與女兒的傷害。亞當諾和霍克海默推斷，缺乏父親造就大眾個人或是獨裁主義的個性，但是缺乏母親的社會則表示喪失未來生活在

自由可能，是個沒有愛與希望的社會。一般而言，缺乏母親的社會在反猶主義與種族主義打下印記。

**種族** 霍克海默和亞當諾爭論種族不是自然特別的特色，而是在特殊社會背景下有影響力的符號。例如反猶主義者，投射壓抑的害怕與冀求超越鄙視者，特別是那些對壓倒性社會與經濟力量懼怕的無能領導者。他們認為納粹主義是精神分析的問題，但是精神分析因素本身也必須了解被經濟政治因素所型塑。

在資本主義社會，反猶主義對中產階級是有經濟上的重要，因為它隱藏在生產關係中宰制的本質。亞當諾和霍克海默指出猶太人在歷史角度上被拒絕進入製造業，所以經常在商業與金融業尋求生計，因此，商業不是他們的才能而是命運。在這些職業的生產力真正本質常隱而不彰，商人和銀行家似乎自生產力的勞工而受益；然而，他們其實只是單傳的中間人，隱藏於資本主義大量製造所分配剩餘財富的事實。猶太人變成整個系統的地方長官並被其他人仇恨。在壟斷資本主義下，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中與中間人的角色變得多餘；但是，猶太人在壟斷資本主義所產生的經濟問題上仍然是好用的代罪羔羊。

猶太人和其他被污名化者很容易成為迫害的目標，他們被用作資本主義的社會分配不當的補償與無意識的反社會權力，而其幾乎沒有受手段性宰制系統的壓制。

1940 年代，一項野心勃勃處理偏見與特別是反猶主義的研究在美國進行。偏見研究是一套五冊的合作著作，包括亞當諾、柏克萊公共意見研究團體（Berkeley Public Opinion Study Group）成員，R. Nevitt Sanford、Daniel Levison、Elsie Frankel-Brunswik 等主要研究員，霍克海默是計畫的總統籌者。探討偏見的主觀表現，其主要理論基礎為心理分析學。

這項研究運用質的工具，例如訪談，以及量的工具。五冊研究為戰後檢視退伍軍人個性特點與偏見態度的*動態偏見 (Dynamic of Prejudice)*、*反猶主義與情緒失控 (Anti-Semitism and Emotional Disorder)* 包含對反猶病人的心理療法案例研究、探討大眾說服工具的*騙局預言 (Prophets of Deceit)*、描述德國反猶主義歷史根源的*破壞預演 (Rehearsal for Destruction)*，以及*威權主義的性格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是檢視偏見與人格特質的關係。

*威權主義的性格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特別關注描繪法西斯主義者可能的人格特質。執行大規模的問卷與訪談，建立 F 等級以衡量反猶主義與反民主的態度。這項研究推斷具偏見的個人有因社會化所導致的明顯個性。偏見與反民主的個性來自權威主義的家庭，順從就是原則，紀律嚴格而且通常是獨斷的，而且任何背離傳統價值的偏差都會嚴厲受逞。這樣的權威主義個性和佛洛姆早期在*權*

威與家庭研究中所討論的受虐個性很相像。

威權主義的性格揭示獨裁主義與偏見的家庭心理分析動態，但是獨裁主義的家庭並不單一產生獨裁主義的孩子，因為在此同時為獨裁的宰制提供模型，但是無法同樣保障個人對抗由額外家庭仲介所宣稱的社會化。正如佛洛姆指出，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與史達林主義有其共同點，他們提供原子般的個人新的慰藉與安全，這些系統是異化的頂點。偏見是持續性的社會問題，因為獨裁主義性格是社會產物，就像家庭動態般的大規模。

亞當諾以獨裁主義的性格與觀察推論，假使恐懼與破壞性是法西斯主義的主要情感來源，性愛就主要歸屬於個人。因此假使偏見受到消滅以及更進一步的性，教育就必須與民主政治緊密結合。

二次大戰後，霍克海默反應德國猶太人的狀況，並推論在納粹時期的受創尚無法克服，他相信以過去知識保護免於重蹈覆轍，更重要的是，教育能使個人批判煽動主義，所以他們能從煽動主義區分真正的理性政治。

### 其他理論與學者

基於篇幅限制，我們把焦點放在學會的四位主要學者，但學會早期還有好幾位重要的學者。路文陶和本雅明對文學社會學感興趣；魏復古(Karl Wittfogel)對比較社會學有興趣；卡爾曼海姆(Karl Mannheim)建立社會學知識，拉查斯菲爾德(Paul Lazarsfeld)對美國社會學的傳播研究很重要；此外，亞當諾在藝術和文化方面產生相當數量的著作，特別是對大眾文化的批判。

批判理論者多樣性著作的主要焦點為資本主義的宰制，在戰時則是法西斯主義社會。他們建議，因為宰制滲入個性的內部核心，宰制通常不會察覺與理解，這使將如何理論化顯得困難，也是對為解放的未來建構當前與系統化的可能造成困難。

### 批判與結論

對批判理論學者的主要批評是他們僅單純地以文化分析代替經濟分析，如此，假使無產階級革命的實踐沒有消除，他們的分析是脆弱的；但是批判理論學者自一開始所認為的，在政治經濟(基礎)與文化/意識形態(上部結構)間的前者區別，在二十世紀就不再主張，兩者批判地相互相關，而且使解放顯得困難。在意識型態與文化的焦點在資本主義社會的受損害心理都是持續關心的一部分，藉由資本主義如何在歷史角度上的改變，以及如何刺激形成更好的世界來作宣傳。然而在1930年代後，亞當諾與霍克海默對種族轉化的可能變得悲觀，也不以直接方式參與六零年代任何激進的學生抗議。

另一個對批判理論的批評，其維持在哲學、非科學性的精神，這無法掌握現代壓迫與宰制的「真正」情況。這樣的批評是有些正確性，但不應該駁回最初學會成員對戰後情況不能、或沒有模擬出二零年代的起源。學會在德國重組後，批判理論的研究維持關注揭露優於國家資本主義仁慈的宰制體制。這樣的關注焦點影響例如哈柏瑪斯等批派理論傳統學生的著作。

一祥翻譯社 樣本  
Do not copy